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



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



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



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目 录

中译本序	1
------------	---

前编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

一 用作引喻的典故	3
二 文人歌的尝试——论大伴旅人的和歌	24
三 六朝诗与《万叶集》——论梅花歌	51
四 引用的意识——大伴家持的和歌与汉籍	66
五 《万叶集》中的七夕歌	95
六 《万叶集》与大陆乐	106
七 《万叶集》与汉语	118
八 和歌与汉诗	129

后编 《万叶集》与神仙思想

第一章 终南山	147
第一节 终南山与吉野	147
第二节 登仙台・望仙宫	155
第三节 三神山	164
第二章 仙女	173
第一节 望夫石	173



第二节	玉岛仙女	182
第三节	渔夫的周围	190
第四节	白云谣	197
第三章	仙界	206
第一节	常世与蓬莱	206
第二节	玉匣之云	214
第三节	藐姑射山	223
第四节	飞翔传说	232
第五节	鸟与仙女	239
第四章	永生	248
第一节	返老还童水	248
第二节	仙药	256
第三节	月中桂树·月舟	265
第四节	明月	274
第五章	生命树	285
第一节	桃	285
第二节	生命树	292
第三节	树下美人	301
译后记		310

中译本序

中国史书有关日本最早的详细记载，见于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迄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两国自隋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历经1400余年。而日本与欧洲各国建交，只有大约短短的150年历史，与前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不仅两国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在此基础上孕育出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关系更为深厚。

在摄取中国文化方面，日本采取了极为有效的手段，并非囫圇吞枣似的盲目引进，而是摄取那些对自身有益的文化，经过加工变形，使其变成自己的文化。

无论多么伟大的文化，如果不去积极接受，当然就谈不上影响问题。对于文化的传播而言，接受比影响更为重要，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由此而言，日本可谓成功地接受了中国文化。“接受”二字在此具有重要价值。完全排斥当然愚不可及，囫圇吞枣亦非明智之举。

那么，日本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究竟其内涵如何呢？我认为，它并不仅仅是指汉民族自身所创造的文化，而是由欧亚大陆各种文化混合形成、酿造成熟的一大文化。



尤其是古代日本吸收的主要是大唐文化,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为开放的时代。大唐文化本身便融入了源自古罗马的中近东文化、以及源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印度文化与北方斯基泰游牧文化等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种具有世界规模的复合文化。日本接受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

日本于公元8世纪编辑的和歌总集《万叶集》,就是在广泛摄取这种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众所周知,到了10世纪后半叶,日本便中止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亦即当时的日本政府做出了停止摄取新的中国文化的决定。由此可见,此前的一段时期才是集中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7至9世纪日本文化所摄取接受的中国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尽管如此,以前学界在此方面研究并不充分,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一是将文学紧紧局限于文学的框架之内来加以探讨。也就是说,将文学与文化剥离,完全不考虑其外在的文化因素。

二是将文学紧紧局限于日本文学的框架之内加以探讨,而没有将日本文学置于与世界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关系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学界终于认识到这种研究的不足之处,开始思考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正好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学术研究道路,有幸成为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一代学者。

但我认为,用“比较”这个词还不够贴切,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终究还是日本文学。更确切地说,我们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发生史及评价作品的价值时,中国文化的接受问题必然成为研究的重



要主题。

我认为,所谓文学研究,就是考察具体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性及感性的高度,以及它如何感动读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阐明接受中国文化对具体作品形成的作用,才是正确的方法。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世界文化。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阐明“中国文化对具体作品形成的作用”呢?

其实在我从事研究之前的先行研究,主要是对日本古典文学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典籍进行梳理。但我认为,这样做往往容易忽视作者引用典籍的真正意图。其实作者出于何种目的引用中国典籍,才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但先行研究对此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个弊端,仅仅注目典籍的一小节,也容易忽视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及其接受过程。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考察日本文学究竟在东亚文学中占据何等位置?给予当今的我们又是何种感动?

本书所翻译的就是我在此领域研究的部分成果。有关我在《万叶集》方面的研究,此前王晓平教授曾经翻译出版过《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有关我在《源氏物语》方面的研究,则有马兴国、孙浩二位教授翻译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欢迎参看。本书所收的文章,主要是论及《万叶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次由刘雨珍教授主持翻译,我感到非常欣慰。刘教授现在活跃于国内外学界,从他的学生时期我就寄予厚望,本书得以出版,不由得感慨系之。

在此谨对丛书主编王晓平教授、本书译者刘雨珍教授、勾艳军



女士以及中华书局致以热忱的谢意,并衷心希望本书能为日中友好做出绵薄的贡献!

中西进

2006 年早春

于日本古都洛西

一 用作引喻的典故

序

在日本古代文献中，有不少从中国书籍中借来某些文字的情况。例如，《万叶集》中山上忆良作《思子等歌》（卷五，802—803），其长歌汉文序中说：“释迦如来，金口正说，等思众生，如罗睺罗。又说，爱无过子。”从佛典引用释迦的话，后面接着申述自己的主张。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像这样明确地写出人名、书名，而在字里行间暗暗插入中国典籍的一部分。就前面提到的山上忆良的《思子等歌》来说，晋潘岳有同样题目的一篇《思子诗》，因而很难认为忆良对它毫无意识。《思子诗》：

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虚盈。

奈何念稚子，怀奇陨幼龄。

追想存仿佛，感道伤中情。

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

第五、六句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思子等歌》的“眼前浮面影，夜来伏枕难安寝”。还是山上忆良，与潘岳一样，在哀悼幼龄夭亡的熊凝



之死的作品的序文中,说:“今日长别,何世得覲”,其短歌“一世难重覲,难忘唯有父母恩”(卷五,851),这些与《思子诗》末尾两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像这样消化了以往的作品,而写成后世之作,毋宁是自然而然的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指出以往作品的影响,几百年以来,这一工作早就在进行着。我们可以在契冲《万叶代匠记》里,看到他巨大的业绩。以上这些都是不需多说的。

然而,在探讨作品的时候,谈到与以往作品的联系,是不是仅仅停留在指出这些类似的地方就够了呢?更进一步地说,指出这些类似的地方对于我们的作品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有效性呢?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探讨它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有效性,指出这种类似的地方才有其价值,作为一种研究的手段,它才有其应有的效果。

例如,柿本人麻吕有关壬申之乱的一首和歌:

.....

高擎大旗翻 春风野火卷荒原
手中弓弭鸣 飘风舞雪冬林间
闻者皆胆寒 万箭齐发如雪乱^①

.....

(卷二,199)

将以上三者对照来看,可知前人的揭示是十分恰当的。特别是《日

^① 本章所引万叶和歌,皆由本章译者王晓平教授所译。——译者注



本书纪》的执笔者引用了《光武纪》来润饰文字，由此文章的格调得到了提高。

然而，我认为事情并非仅此而已。《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引用它们，或许并不是单纯停留在润饰文字上，而可能有更深的意图。这暂且放在后面来剖析。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引用，对于它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现在我试以天津皇子事件为材料来考虑这个问题。不用说，所谓天津皇子事件，是指朱鸟元年(686)十月，时值天武天皇驾崩不久，天津皇子企图谋反而被发觉，当即赐死的事件。其事除《日本书纪》有两处记载以外，还见于《万叶集》、《怀风藻》。据《日本书纪》持统称制前纪，十月二十九日(丙申)处刑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诏曰：皇子天津谋反，诖误吏民帐内，不得已。今皇子天津已灭，从者当坐皇子天津者，皆赦之，但砺杵道作流伊豆。又诏曰：新罗沙门行心，与皇子天津谋反，朕不忍加法，徒飞驒国伽蓝。

而自古以来便有人指出，《日本书纪》这段记载，是以《汉书·景帝纪》如下记事为基础写成的：

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兵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



赦之。楚元王子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

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如上《日本书纪》的部分比较，语句相通是明显的，可以说《日本书纪》是模仿《景帝纪》而写成的。

《日本书纪》的执笔者由于如上的引用，便将大津皇子置于与吴王刘濞等量齐观的立场。假如知道《景帝纪》的人读到《日本书纪》的话，便很容易想起刘濞。即使他不喜欢大津皇子，也会将他们重叠在一起。退一步说，引用《景帝纪》写出《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即使说自己只借用了文字，那么对于读者将大津皇子与刘濞重叠的结果，也不能不负有责任。当然这样的结果《日本书纪》的执笔者是全然了解的。可以说，他是明明知道却反而出于将大津皇子比作刘濞的意识积极地作了以上的引用。如果不这样看，而认为他是无意中导致了承担责任，作为著述的态度来讲，是不大可信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书纪》的执笔者看来是文章里手，这从下面可以知道。据《汉书》（卷三五，列传五）来看，吴王刘濞是位年轻武勇的人：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子濞，封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

与二十四岁去世的大津皇子不同，这里记载了吴王刘濞二十岁时活跃的情况。不过，据《怀风藻》的传记，也说大津皇子“及壮爱武，